

[ 采桑子文丛 ]

# 浦江拾忆

魏绍昌 著 冯沛龄 编

有人说魏绍昌先生是文化界的「电话号簿」，一份文学艺术的「大地图」，一部文史掌故的「活辞典」，只需给他打个电话许多事情便能迎刃而解。这从本书中便可略窥一斑。作者立于浦江之滨，拾起记忆朵朵，说作家，论学者，谈艺术家，回忆与他们的交往、交流，不经意间常带出发生在文艺界的桩桩奇闻趣事；民国文坛、影坛、画坛、艺苑的历史风貌，乃至旧上海光怪陆离的历史事件、旧上海闻人的逸闻轶事，均呈现纸上，让你领略不同的人生和平凡的岁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采桑子文丛 ]

# 浦江拾忆

魏绍昌 著  
冯沛龄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浦江拾忆/魏绍昌著;冯沛龄编.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4

(采桑子文丛)

ISBN 978-7-222-05751-7

I. ①浦… II. ①魏… ②冯…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8505 号

责任编辑:赵石定 程 静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洪中丽

|        |                         |
|--------|-------------------------|
| 书 名    | 浦江拾忆                    |
| 作 者    | 魏绍昌 著 冯沛龄 编             |
| 出 版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br>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发 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邮 编    | 650034                  |
| 网 址    | www.ynpph.com.cn        |
| E-mail | rmszbs@ public.km.yn.cn |
| 开 本    | 889 × 1194 1/32         |
| 印 张    | 7.5                     |
| 字 数    | 200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
|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排 印    | 昆明合骧琳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
| 书 号    | ISBN 978-7-222-05751-7  |
| 定 价    | 22.00 元                 |

# 目 录

- 回忆郭老二题 /1
- 茅盾的新疆之难 /7
- 《家》三题 /11
- 夏衍同志二三事 /27
- 陈荒煤在重庆图书馆的时候 /35
- 吴组缃先生生活在我心中 /41
- 和以群共赏京剧余派戏 /44
- 两记张爱玲 /49
- 回忆两种现代文学丛书 /55
- 新文学的盗版书掀谈 /64
- 赵丹绘画二三事 /70
- 叶浅予笔下的王先生和小陈 /72
- 王先生与蜜蜂小姐 /82
- 黄尧及其牛鼻子 /88
- 阿斗式的幽默与讽刺 /98

|                         |      |
|-------------------------|------|
| 难忘的梁白波                  | /104 |
| 张正宇画猫                   | /110 |
| 文坛茶话图                   | /114 |
| 民国电影的三大要点               | /116 |
| 电影明星穿土布及其他              | /122 |
| 从梅兰芳一家串演《大马戏团》<br>而想起来的 | /127 |
| 谭鑫培轶闻                   | /132 |
| 从越剧的起飞说起                | /141 |
| 张学良做过的两件好事              | /165 |
| 黄金荣与露兰春                 | /174 |
| 杜月笙与孟小冬                 | /189 |
| 五夫四世/                   | 202  |
| 附录/                     | 219  |
| 编后记                     | /237 |



## 回忆郭老二题

1946 ~ 1947 年在上海

大革命失败，郭老避居日本，是从上海出发的；十年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郭老回国抗战，又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经过八年抗战，郭老又到上海，上海人民都对他重回故地倍增亲切的感情。郭老是1946年5月上旬到上海的，我在5月21日上午去拜访了他，是吉少甫同志陪我去的。那时老吉主持的群益出版社，也从重庆迁移到了上海，有出版全套《郭沫若文集》的计划，我曾把几本郭老过去在泰东、光华、现代等书店出版的早期著作，送给他们备用。当我知道敬仰已久的郭老到了上海，很想见见他。老吉征得郭老的同意，满足了我的要求，当时他住在虹口区溧阳路，是沿马路有木栅门的一座日本式小洋房。我们在楼下会客室坐定，老吉上楼把郭老请了下来。郭老见了我，先向我表示了赠书的谢意，仔细问了我的姓名，说要写一幅字送给我。因2月10日他在重庆校场口的会场上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我便向他表示了敬意的慰问，并问他受伤的情况。他只说胸部有时还有点隐痛，接着告诉我：刚听到的消息，国民党十万官兵被我们的部队包围起来了。国民党是不中用的，内战是打不久的。其时因不见于立群同志，老吉就问：“于先生哪里去了？”郭老回答：她陪孩子去学校报名了。他随即喟然叹道：“过去我们骂教会学校，现在自己的孩子也只好往教会学校送。”言下之意，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制度实在腐败不堪，学校成了学店，退而求其次，还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抓功课方面比较好些。我们这第一次见

## 郭沫若鬻字例

|       |                                              |
|-------|----------------------------------------------|
| 直幅    | 紙幅長度每尺國幣八萬元寬度以一尺半為限<br>逾此限加倍計值 橫幅同例          |
| 對聯    | 六尺二十四萬元 五尺十八萬元 四尺十五萬元 三尺十二萬元 以五七八言為限 字多或紙長另議 |
| 扇面    | 以上兩類紙長過一寸者作一尺計<br>每件十萬元                      |
| 冊頁    | 每件八萬元 以一尺為度逾尺加倍計值<br>以上四類用金鑲者加倍計值            |
| 題簽 名片 | 每件五萬元                                        |
| 匾額 招牌 | 每字一尺以內三萬元 一尺以外六萬元<br>二尺以外十二萬元 逾三尺者另議         |
| 題跋    | 每百字三十萬元                                      |
| 摹一題   | 每件三十萬元                                       |
| 墨費二成  | 外埠寄件加寄費一成                                    |
| 潤金先惠  | 點品不應 約期取件 期促不應                               |

收件處：  
一 各埠大書局  
二 上海虹口東陽路一二六九號（門牌七一九號）  
三 山陰路重慶里七十七號 羣益出版社  
電話：（〇二）六二七八五號

## 郭沫若自訂的賣字潤格

面的時間很短，但他精神飽滿、和藹可親的態度給我深刻的印象。

以後，我沒有再去拜訪過他，但在第二年他也有兩件事我是知道的，一件是曾經自訂潤格，公開賣字；一件是離開上海去香港的情況。

1947年夏天，郭老因經濟上較為拮据，曾對我的同學郭若愚同志（甲骨文研究工作者，當時常去郭老處請教問題）講起，他的稿費收入不如茅盾同志的多，為了開源，決定公開賣字，於是自訂了一份潤格，要吉少甫印刷了幾十份，又要郭若愚分發給河南中路福州路一帶的箋莊店（如九華堂、榮寶齋、朵雲軒、西泠印社等書畫社）代為收件。郭若愚取到印成的郭老潤格時，曾拿來給了我一份。這份珍貴的“郭沫若鬻字例”，用三十二開報紙鉛字排印，字體紅色，與當時通行的用宣紙印刷的墨色潤格迥然不同，可謂別具風格。當時標價的國幣萬元相等於人民幣一元，定價是相當大眾化的。注明的三處收件處除了各家箋扇莊和羣益出

版社之外，虹口区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就是郭老的住宅，六二三四九号就是郭老家里的电话。在当时那样险恶的局势和复杂的环境下，郭老敢于公开自己的住宅和电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这就充分体现了郭老坦率的胸怀和卓越的胆识。郭老因当年11月便离开上海，所以在上海卖字不过四个多月时间，这份润格的印数很少，传布有限，所以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了。

当时国民党挑起内战后不断惨败，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了。在11月初，叶以群同志将去香港，他把他主持的新群出版社的有些事务委托了我，告诉我说：天快亮了，但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这样的时刻特别要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狗急跳墙，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党为了保护当代文坛两座重镇的安全，必须请郭老、茅公暂时住到香港去。由于他们两位的目标大，决定不坐飞机，而分别乘船走，他们的家属稍后再去。这个陪送任务本来是于伶同志担任的，临时于伶病倒，便由以群担任。以群就通过我介绍的一家银行，开了支票去买了四张船票，两张是11月12日的，由漫画家丁聪陪茅公同走；两张是11月14日的，由以群陪郭老同走。

就在这几天内，郭若愚来看我，说起他还有事想向郭老请教，我脱口而出：“要去快去，他快走了！”后来郭若愚见过郭老又来告诉我：他问郭老是不是快要离开上海，郭老听了一惊，推说还没有最后决定，支吾过去了。但当天郭老把郭若愚借给他的一批有关甲骨文的图书全部奉还，还替郭若愚叫了一部黄包车装书，亲自送到门口。我听了郭若愚的转告，顿悔自己的失言，这样的事情是应该严守机密的，处于那种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即使是对自己的同学，也不该随便泄密，我太缺乏警惕性了，这也说明我当时在政治上是何等的幼稚！郭老的态度，给了我一次



深刻的教育。

### 关于《养猪印谱》

60年代初期，我编过两本印谱，都是方去疾、吴朴堂、单晓天三位上海篆刻家刻成的，一本是《养猪印谱》，一本是《古巴谚语印谱》。前一本是为了配合大跃进时掀起的养猪高潮；后一本是响应1961年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两本印谱都取材于当时报刊上的新鲜材料。篆刻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艺术，我想推陈出新，利用印章这块“方寸”之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做到古为今用。两本印谱前后编成之时，都寄呈郭老教正，并请他题签作序。郭老收到后，很快就寄来了他写的题签和长篇序诗，对我们的这种尝试性的新作，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和鼓舞。《古巴谚语印谱》收印章四十七颗，已于1964年10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养猪印谱》当初曾在上海博物馆公开展览，得到金石界同志的好评。但它是大跃进的产品，随后由于我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养猪方针一度有所改变，当时的出版社要我们加以修改才能印行，我认为一改动势必打乱整个结构，比较难办，而且部分印章重刻也颇费时，所以便搁置下来了。不过郭老在1962年初的《人民日报》连载他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却把他为《养猪印谱》写的序诗收进札记中去了。在第七十则《讼堂养猪》中，郭老写道：“前年有三印人辑成《养猪印谱》分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宝藏篇，荟萃养猪号召，分刻印章一百颗而拓制成谱。索余为序，余因题诗一章，新诗人中有见余诗者，颇嫌不大庄重，实则我乃以极端庄重之态度出之。猪之当被重视，即在今日似亦尚待进一步普及。”这段介绍文字之后附录了序诗原文：“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

# 养猪印谱

郭沫若题

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钢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郭老的序诗，就是选用我编写的印文巧妙地连缀成篇的，末尾还有两行题识：“一九六〇年十月八日晨，接阅《养猪印谱》，信笔书此，以粪其首。”

十年动乱之后，令人高兴的是这本冷搁了十七年之久的印谱，据说又可以出版了。1977年5月我们将这个喜讯写信报告郭老，并请他对这本印谱重加审阅。几天之后，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同志复信说：“正赶上郭老生病住医院，医生嘱近十天左右不让他看东西，但此件我们还是准备让他过一过目，这



养猪大有学问  
(单晓天刻)



让每头母猪多子  
多孙 (吴朴堂刻)



养猪好处多得  
很 (方去疾刻)

须待到下月初了。”到7月8日，王廷芳同志又来信告诉我们：“最近趁便请郭老审阅一遍，郭老认为：《养猪印谱》得以出版，很好，‘序诗’照原版刊印即可，因现在手抖，就不另写字了。”当时我们捧读来信，都很兴奋，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是后来使我们感到无比遗憾的，不但是郭老在逝世前没有见到这本印谱的出版，而且直到现在，郭老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这本印谱仍然在难产之中，尚未公诸于世。回想起郭老生前对这本印谱的热情关怀，大力支持，特别在他身患重病之际，还是对我们不断鼓励，继续支持，这些情景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我写到这里，心情感到非常沉重，非常难受。

## 茅盾的新疆之难

1979年2月8日茅盾先生写了一封给赵丹同志的信，由北京寄到上海，托我转交。因为抗战初期，他们在新疆有过一年光景的共同遭遇，信中茅盾询问赵丹那时的一些情况。其时赵丹的身体时感不适，于是拖至当年冬天才由他回忆口述；托我执笔写了回信。现将茅盾的来信照录如下。

赵丹同志：

请您回忆，你们共几人到新疆，何年何时到的，坐什么交通工具。你们到新疆后演的第一个戏是什么戏（话剧名字我不记得了），后来又演过什么话剧。你们是暂时住在汉族文化协会的院子里，是否有个打球的空地，打何种类的球？有个姓王的空军人员常来和你们玩球，熟了后说些不满于盛世才的话，因为你们的警惕性高，就由徐韬到我家里研究此人。我与徐韬决定不管如何，先写信给盛世才报告此事。（因为很可能此人是盛世才派来试探你们的），盛世才得信极称赞你们做的对。后来我从孟一鸣（教育厅长，延安派去的）那里知道空军中有人被抓了，猜度起来，因其确是盛世才所派，而嫌其太蠢，故仍逮捕。此事何时发生，能记得其大概的时间么？请赐复。即致敬礼！

沈雁冰（1979）二月八日

赵丹的回信就是据来信提出的几点一一作答，也还补充了一些细节，后来在茅盾写的回忆录中，基本上都采用了。第二年（1980）初夏，赵丹就住进了医院，至10月10日因胰腺癌不治去

世。第三年（1981）3月27日茅盾接着也去世了，所以1984年《新文学史料》上茅盾的回忆录连载至《新疆风雨》这一章时，两位均已作古，我读了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盛世才是1933年新疆一次政变中上台的，因地处边陲，蒋介石忙于剿共，鞭长莫及，盛世才利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打出“反帝、亲苏、清廉、建设、民平（民族平等）”六大政策的旗帜，实际是建立了法西斯专政的独裁王国。民主进步人士杜重远受其蒙蔽，1937年写了一本《盛世才与新疆》，替他宣扬。抗战兴起，杜又约了茅盾、张仲实、萨空了等文化界名人共赴新疆建设。1939年初茅盾偕夫人孔德沚与张仲实在去新疆的途中，已经风闻到盛世才两面派的一些做法，不过他们既已应邀，就没有从最坏处考虑，还是不辞道路的艰险，在2月20日抵达新疆。茅盾和张仲实除在杜重远任院长的新疆学院执教外，担任了新疆文化协会的正、副委员长。新疆的14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促进会，这个新成立的文化协会就是统领各个促进会的。茅盾等看到了新疆的实际情况，知道已经上当受骗，经过同延安派来工作的同志商量，决定“多做事，少说话”，静待时机，再谋脱身。

不料6月初盛世才收到了赵丹、徐韬具名从重庆打来的一份电报，表示他们从事影剧工作的四对夫妻（赵丹与叶露茜、徐韬与程婉芬、王为一与俞佩珊、朱今明与陈瑛）和一位搞音乐的易烈，九个人渴望来祖国的边境开展话剧运动，要求盛督办批准入疆。盛世才将电报给茅盾、张仲实看了，两人知道这是赵丹等受了杜重远那本小册子的影响，真以为这里大有用武之地。因他们直接与盛世才联系，已不便明显地阻止，为了不想让他们自投罗网，便对盛说这几位住惯大城市的艺术家恐怕过不惯此地的生活，并且这里没有演话剧的基础，他们除了演戏，也做不了别的事情，

建议盛婉却为好。盛就让茅盾拟电劝阻，哪里想得到赵丹等没有领悟回电中茅盾的苦心暗示，马上又来电报披肝沥胆地表示不怕任何的艰难困苦，决意要来。于是盛世才复电让他们来了。

两个月后，四位女的在兰州搭上飞机先到。五位男的是坐车长途跋涉通过大戈壁才到的。他们沿路也听到了“入疆不易出疆更难”之类的风声，因此当茅盾代表盛督办去欢迎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这里的实际情况。茅盾私下告诉赵丹和徐韬，这里虽然不准讲国民党的好话，也禁止和苏联领事馆接触，盛世才对内地来的人都存戒心，到处布满了密探。谈到电报的事，赵丹说根本没有想到其中的别有用意，以为不过是怕我们吃苦的客气话。然而事已至此，悔亦无用，先将话剧运动开展起来再说吧。好在赵丹等组成的话剧实验团，隶属于茅盾主管的文化协会之下，随时可以得到照应。

新疆原来只有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舞蹈，戏曲只有秦腔，从未演过话剧，但赵丹主演的影片《马路天使》是放映过的，所以各族青年对话剧还是欢迎的。公演的第一个戏是章泯编的五幕剧《战斗》，讲沦陷区群众抗日的故事，戏在1939年“9·18”八周年的纪念日首演，当天《新疆日报》出了特刊，茅盾写了介绍文章。此戏居然连演一个多星期，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随后陆续推出了阳翰笙的《塞上风云》、章泯的《故乡》和几个独幕剧，卖座也都不错。

1939年10月已发生杜重远冤案，11月又有大批干部被捕，茅盾等人益发不安起来，都想早日离开这块是非之地。1940年初，张仲实接到伯母去世的电报，盛世才虽然口头同意他回去奔丧，可是一直没有给他放行的机票，这样就可以无限期的拖延下去。4月20日茅盾也接到了母亲在故乡乌镇逝世的电报，盛世才仍然作了同样的对付；后来茅、张经过不少周转，特别是取得了延安派

来工作的同志的帮助，才能搭上5月5日苏联过路的便机。飞机原定直飞兰州，可是飞到哈密却奉命暂停过夜，第二天再飞。茅盾夫妇和张仲实这一夜通宵没有合眼，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所以当飞机飞过新疆边防的猩猩峡，他们犹如逃出了鬼门关一样的轻松。茅盾多年后才知道，那天盛世才放走他们后，又反悔了，立即勒令飞机在哈密降落。当夜盛给哈密的行政长官连续打了三次电话，第一次叫将茅盾夫妇和张仲实三人扣留下来，随即打来第二次叫等一等再执行，至深夜三点钟打来的第三次电话中，盛世才方说了句：“算了，让他们走吧。”

茅盾离疆后隔不几天，赵丹、徐韬等许多进步人士就被捕了。再不久，纳粹德国向苏联宣战进攻，盛世才便撕下伪装，暴露了反共的真面目，不但处死了杜重远，而且对延安派去工作的许多同志以及中共驻疆的要员陈潭秋、毛泽民都下了毒手。赵丹、徐韬等则被关押了四年多，直至1944年国民党中央军队进驻新疆，盛世才垮了台，方从狱中释放出来。

赵丹是1945年初回到重庆的，他和茅盾见面时，两人不约而同的都说了一句：“我们是虎口余生的人。”当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11月赵丹在重庆主演了茅盾新写的剧本《清明前后》。这次演出，茅盾和赵丹又都说是对他们两人在新疆一段患难之交很有意义的纪念。

## 《家》三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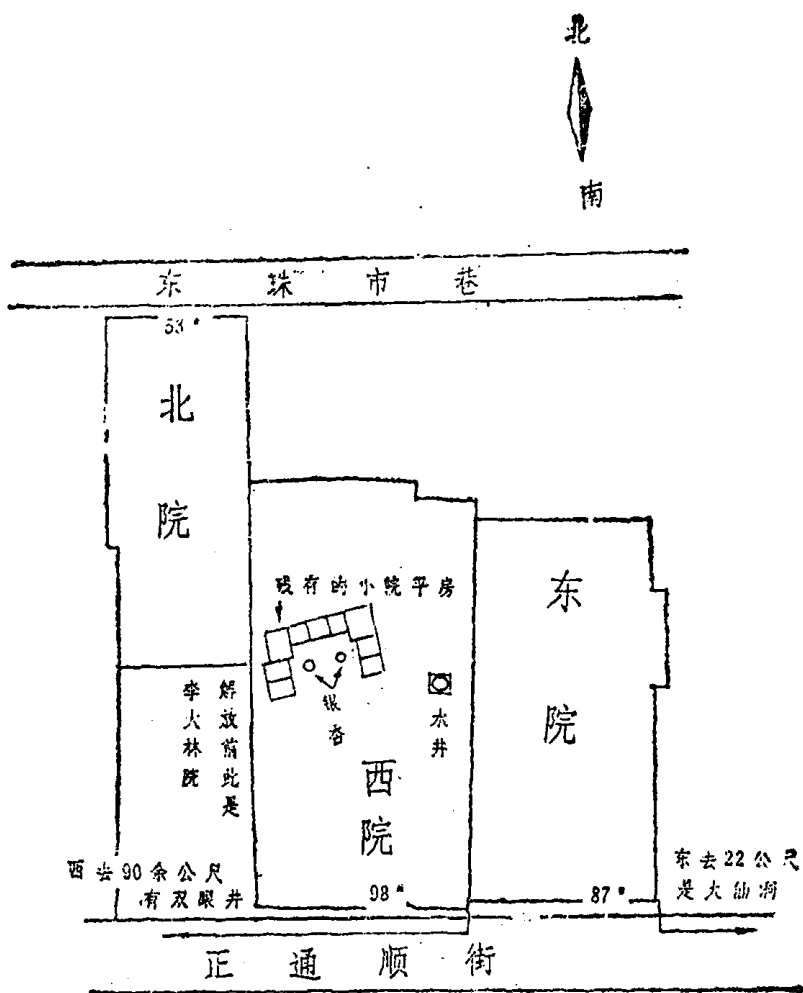
### 故 居

1985年5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中文系联合主持的巴金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我应邀参加前向巴老辞行，他因年迈体衰，未便前往，却热情地祝愿我在他的家乡生活愉快，我感谢他的好意，便问起他在成都的老家，他笑了一笑说：“现在变成战旗文工团的团址了。”

我在成都由四川省作家协会的谭兴国同志陪同去西城区正通顺街九十八号战旗文工团，其实巴金故居在这里只剩下一株桂树和东边长约八十公尺的一堵青砖砌成的墙基，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在原址上矗立着的一长排西式楼房。

巴金十九岁那年（1923）离开成都之后，直到1941年12月才回到家乡。他在《谈〈憩园〉》中说：“我走过我离开十八年的故居，街道的面貌有了改变，房屋的面貌也有了改变。但是它们在我的眼里仍然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见到旧雨故知一样。石板道变成了马路，巍峨的门墙赶走了那一对背脊光滑的石狮子。包铁皮、钉铜钉的门槛也给人锯掉了。我再也找不到矮矮的台阶下，门前路旁那两个盛水的长方形大石缸”，因为“新主人是保安处处长”，“门前还有武装的兵在守卫。”所以巴金这一次和“过了一年多”的第二次回成都，都是过门而不入。又过了将近十六年，巴金在解放后的1956年12月第三次回成都，“那个作威作福的主人已经完蛋了，我终于得到了进去参观的机会。”可惜巴金没有写下他进去参观的景象，由于战旗文工团是在1958年扩并了巴金故





解放前东珠市巷五十三号正通顺街九十八、八十七号平面示意图

居，也许那时里面的大厅、堂屋和桂堂尚未全部拆除，都还保持着旧貌吧。此后又过了四年，1960年巴金第四次也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回成都，他看到的故居“又干净、又简单、又大方的西式大门使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门墙上钉着‘战旗文工团’的牌子”了。